史料分析

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
—— 由陳岺、楊水心日記談起

許 雪 姬*

一、前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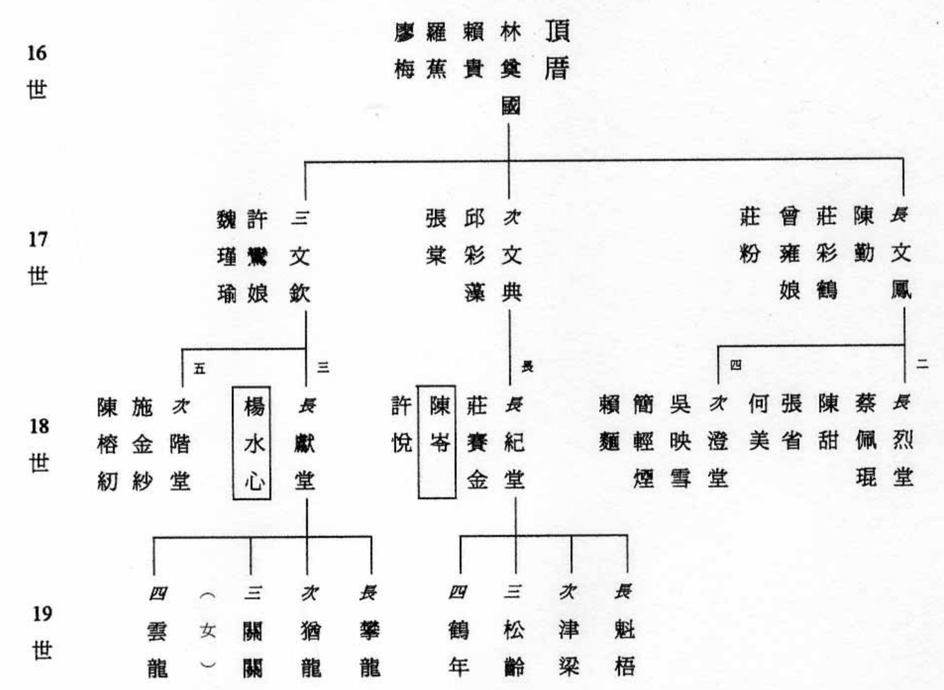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游鑑明女士，在爲慶祝中研院 80 週年院慶所拍攝的人文組錄影帶時，說了如下的一句話：日治時期因爲沒有台灣女性自己辦的雜誌，因此，相對於同時期中國女性歷史的研究，台灣女性史的資料不多。這雖是與同時代中國女性比較下的結果，但也說明了做爲過去難以發聲的婦女，研究的素材極爲缺乏，即使有，也是透過男性的觀察取得資料。然而近一年來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日記解讀班，卻有幸解讀兩份日治時期婦女的資料，此即陳岺日記、楊水心日記，對研究上流紳士家族的婦女史提供了極重要的素材。

陳岺、楊水心這兩位記主[1] 是堂妯娌，也是霧峰林家頂厝林紀堂、林獻堂的妻子。以下是簡單的世系圖，框內爲記主。陳岺的日記僅存 1923

*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

1 「記主」指的是寫日記者，筆者襲用吉成勇編，《日本「日記」總覽》(東京：新人物往來社，1994) 不著頁數，凡例：「記主は、當該日記の作者を指し」。
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

取材自林獻堂編，《林氏族譜》。

年的，且這一年缺了 124 天；她在日記中說她無法每天寫日記的原因是因為事煩心亂。[2] 而日記僅存一本，和她燒却日記有關。[3] 至於楊水心的日記存有四年，1928 年缺 48 天，1930 年缺 27 天，1934 年缺 107 天，1942 年缺 220 天。除了有時没寫外，也有沒寫完的，甚至缺字，亦即一個字沒有寫完，就嘎然而止。雖然上述兩人的日記不全，但因為到目前為止，

2 〈陳岑日記〉，於 7 月~8 月日記間隔有：「余自數月以來事煩心亂，日記大半失記，未稔何時得享清福也，一歎！」

3 如 1923 年 11 月 26 日日記記載：「今早檢查十一年日記，閱畢付炬。」11 月 28 日又載：「余出外書房撿歸余大正五年及七年日記，因被逆子偷走二本，係十年餘，盡皆付丙。」

尚未發現由士紳家族婦女撰寫的日記，再加上，她們的丈夫也有日記，可以相互對照。這種夫妻都有日記的例子，相當少見，使上述日記更具研究價值。本文主要探討這兩位記主的生平，日記的內容，以及在日記中呈現的生活，並提出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。

二、日記的記主與描述

(一) 記主

1. 陳岺 (1875.農曆 2.2～1939.12.24)，父親早逝，母親守寡，在 1923 年被台灣總督府旌表節孝。[4] 長兄陳杰夫，曾任職棟軍，[5] 丈夫林紀堂 (1874～1922.1.15)，是霧峰林家頂厝的大少爺，林文典的獨子，在叔父林文欽過世後，分得 1/5 家產，[6] 先娶莊賽金 (1874～1919.10.24) 爲妻，後又娶陳岺、許悅 (1892～1990.3.13) 爲妾。莊賽金無出，陳岺倒是替林紀堂生了四個兒子，依序爲魁梧、津梁、松齡、鶴年，長子魁梧與次子津梁，幼年時期在台中廳廳長枝德二的協助下赴日本就讀，不過，這兩位小留學生適應不良，讀完中學後即返回台灣，三子松齡與四子鶴年，則是在讀完中學後才前往日本，最後只有林鶴年取得大學學歷。[7] 林紀堂早在過世前二年 (1920 年) 時，做了遺言公證，將其部分財產分給生母張棠 (或寫成張桐)、兩個側室陳岺、許悅養贍租，[8] 之後再分家產給

---

4 1923 年 2 月 7 日：「接兄來二號函云，請節孝之事已准，來七日表彰云云。」

5 「臺紳陳杰夫於清歷時代以知縣候補受知於林觀察朝棟，乃移居北部，為林營辦各善後，並晉接於宦門宦徒中，政稱為卓卓者。」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明治 34 年 9 月 10 日，第千八號，版 4，〈雜事〉。

6 許雪姬，《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》頂厝篇 (豐原：臺中縣立文化中心，1998)，頁 4-5，〈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〉。

7 林鶴年在台中一中畢業後，即到日本入日本大學研究政治，後以興趣考入日本東洋音樂大學，畢業時成績優異，得日本二條公爵基厚音樂獎勵獎。見商業新聞社，《台灣名人傳》(台北：該社，1956)，頁 60。

8 〈公證第參千八拾五號遺言證書謄本〉，大正 9 年 9 月 22 日，公證官吏代理台灣總督府法院書記山內日陽。此文件為林津梁子林榮宗提供，謹致謝意。

四個兒子。有鑒於長子的揮霍無度，因此反而將家產分給長媳楊碧霞（楊肇嘉妹)。陳岺在 1922 年丈夫過世後，主持大計，最重要的任務是管理眾多的傭人、土地買賣、贌田佃耕、納租，尤其是監督諸子就學，十分吃力。此外，她還要善盡家族義務，例如參與甲寅公、景山公的祭祀公業等，都必須分擔負責。她經常飽受諸子之氣而借酒澆愁，甚至難以入眠。[9] 魁梧時常以用度不足爲由，不斷向陳岺索求家產，使她不得不委託林獻堂、律師土屋達太郎，代爲付給每月 200 円的生活費。[10] 最後終於以 2 萬円和魁梧切斷金錢關係。魁梧取得 2 萬円後，盡力花用，組織繹樂軒社公演，不久即將錢用罄。[11] 而後魁梧爲了奪得妻子繼承自父親林紀堂的 500 石租，[12] 竟否認其女兒貞子爲親生，並以妻子不履行同居義務爲由，強行與妻子離婚。[13] 由於魁梧的行徑令她傷透了心，因而在日記中，只有三處提到「梧」，其餘均以「那逆」、「逆子」、「禽獸」稱之。[14] 次子津梁花費亦不知節制，以致於就學期間，即遭陳岺警告，若再如此耗費，就不願意當其「後見人」(監護人)，1929 年後財產乃交由津梁自己管理。[15] 津梁原來在台中市楠町有家屋與土地，旋即蕩盡，不得不搬回霧峰，依賴母親每月的濟助過活。[16] 陳岺氣極了，生前即留

9 如 1923 年 9 月 2 日記，「余因悶悶不樂，夜飲酒數杯」。

10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8 月 30 日。李毓嵐，〈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〉，收於許雪姬主編，《日記與台灣史研究：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》上冊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，2008)，頁 61。以當時公學校教諭 1 個月薪水不足 20 円，可見 200 円是一筆大數字。

11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鍾淑敏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（二）一九二九年》，頁 275，1929 年 10 月 5 日。

12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何義麟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（三）一九三〇年》，頁 73，1930 年 3 月 3 日；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呂紹理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（六）一九三三年》，頁 349，1933 年 9 月 10 日，原有 6 甲地，但因水崩只剩 3 甲地。

13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鍾淑敏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（二）一九二九年》，頁 141，1929 年 5 月 14 日。

14 如 1 月 6 日稱「逆子」，1 月 7 日稱「禽獸」，1 月 27 日稱「逆子」、「禽獸」，11 月 15 日稱「孽子」。

15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鍾淑敏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（二）一九二九年》，頁 316，1929 年 11 月 14 日。

16 林獻堂著、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（七）一九三四年》，頁 449，1934 年 11

下遺言公證，將其養贍田信託，打算在過世後，除了部分留給其孫 (主要是津梁之子) 外，其餘由松齡、鶴年繼承。[17] 由於上述的家庭困擾，導致她經常悶悶不樂。終至 1939 年，告別她 65 歲的人生。

2. 楊水心 (1882.10.6-1957)，彰化人，父楊晏然，爲楊吉臣家族，有弟弟二人即樹德、天佑，以及妹妹水有、水芋等人。曾經受過私塾教育。14 歲于歸林獻堂，時林獻堂 15 歲，兩人之間育有攀龍、猶龍、關關、雲龍。四人自幼即被送往日本讀小學，最後都升至大學。攀龍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，遊學英、法；猶龍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；雲龍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；關關原來也在日本讀中學，卻因祖母念孫心切 (羅太夫人共有 5 個男孫，關關是唯一的女孫) 輟學回台，畢業於台南長老教女子中學，後來再赴日本讀大學二年，又因祖母掛念，再度回到台灣。[18]

林獻堂一生中去過日本多次，有時是出於政治情況惡劣考量，不得不前往東京避難，譬如 1936 年發生祖國事件[19] 後，翌年 5 月離台赴日；1938 年則是因爲跌傷足部，必須靜養而滯留日本。[20] 當他不在家中時，大小事情都由楊水心掌理，夫妻之間利用書信、電報往返，交換意見，她將家事處理得井井有條。若非楊水心肚量大、好客、有見識，恰如其分地扮演林獻堂妻子的角色，林獻堂無法成就其政治事業，甚至能在晚年遁居日本。[21]

最令楊水心失望的，莫過於林獻堂晚年與照顧林博正的傭人秀玉有

月 30 日；林獻堂著、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八) 一九三五年》，頁 25，1935 年 1 月 20 日。他原有租 2,500 石，不到 5 年時間全用光。

17　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呂紹理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六) 一九三三年》，頁 378，1933 年 10 月 1 日。

18　「故人略歷」，見〈故高林關關女士告別禮拜〉1996 年 12 月 28 日，頁 5。

19　指是年林獻堂參加台灣新民報社主辦的華南考察團，到中國廈門、上海等地考察，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，說「此番回到祖國」，為日本間諜獲悉，轉報台灣軍部，5 月在《台灣日日新報》刊登此事，對其大加撻伐。6 月 17 日日本在台的始政紀念日，召開於台中公園，台灣軍荻洲立兵參謀長嗾使日人賣間善兵衛批林獻堂之頰，史稱「祖國事件」。

20　許雪姬，〈《灌園先生日記》的史料價值〉，收入林獻堂著、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一) 一九二七年》(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、近代史研究所，2000)，頁 V。

21　林獻堂於 1949 年 9 月 23 日以「赴日養病」為由，居留東京直到 1956 年 9 月 8 日病逝。

染，還生下一子琇南。當楊水心得知後，立刻要林獻堂火速處理，並親自趕到台中林獻堂彰化銀行的宿舍守著，不讓秀玉再接近其夫，最後以 650 萬元的代價解決此事。[22] 1956 年林獻堂辭世移靈回台時，秀玉帶著兒子琇南前來奔喪，此事爲林氏家族帶來很大的困擾。[23]

最令楊水心傷心的，則是次子猶龍夫妻早她而去。猶龍妻子藤井愛子是日本人，才剛嫁入林家不久，夫婿即隨公公林獻堂赴歐美作一年多的旅遊，新婚離別，又是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，還要與不懂日文的婆婆相處，委實是件困難的事。愛子後來習會台語，又能討公婆歡心，逐漸在楊水心的心目中分量加重。後來當猶龍和艷秋 (後來的續絃) 出軌，猶龍、愛子間的感情日益惡化時，楊水心毋寧是站在兒媳這邊，一直想託人從中化解。1940 年，愛子在猶龍赴日時，因生面疔引發敗血症過世後，[24] 猶龍一直與艷秋同居，但楊水心力阻，不願兩人結婚、登入戶口，[25] 直到 1949 年初，才和艷秋第一次見面。[26] 1955 年 7 月猶龍驟逝，當時楊水心人正在日本，身旁有關關陪同，這也是林獻堂於 1949 年 9 月離台後，夫妻久別後的首次會面，頃刻間，楊水心必須趕回台灣，林獻堂在日記中寫下夫妻兩人驟聞猶龍過世的情景：「如聞晴天霹靂，大驚之餘，欲哭無淚，惟有與內子相對悲哀而已。」[27] 她最後一次到日本，則是在林獻堂病重時，再度赴日本送終。

楊水心有不少友人，像是彰化的柯甜子、霧峰的何秀眉，前者在日記中以「甜姊」稱之，後者還一度成爲攀龍婚配的對象。[28] 何秀眉曾經赴日學習洋裁，回台後開設裁縫學校。楊水心和妯娌之間相處和睦，尤其與四嬸賴麵情同姐妹，還有林資彬之妻吳素貞。她亦很能安慰人，時

22 林獻堂著，〈灌園先生日記〉，1947 年 9 月 15 日。

23 《聯合報》，1956 年 9 月 21 日、22 日，3 版。

24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張季琳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十二) 一九四O年》，頁 253，1940 年 9 月 14 日。

25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十三) 一九四一年》，頁 133，1941 年 4 月 4 日。

26 林獻堂著，〈灌園先生日記〉，1949 年 1 月 16 日。

27 林獻堂著，〈灌園先生日記〉，1955 年 7 月 17 日。

28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11 月 28 日。

常替別人出主意。參與台中婦女親睦會、一新會的相關活動；她本人不但放足，也沾菸酒，時常與丈夫、家人飲酒話家常，和林獻堂討論重要的事務。她不僅是稱職的賢內助，也活出自己的人生。

(二) 日記的描述

要讀懂這兩位女士的日記，除了對霧峰林家要有基本的認識外，也應先瞭解她們寫日記的動機。從陳岺燒日記、楊水心日記不全的情況看來，兩人應該沒有死後留供後世參考的考量。由於兩人的丈夫都有寫日記的習慣，尤其是楊水心在 1930、1934 年的日記，有部分文字與林獻堂日記相當雷同，[29] 恐有部分「抄」自其夫的日記。她們寫日記的動機，姑且不論是自主或模倣，都是以自我爲中心的描寫。其次，談到日記中的記載與闕如方面，有的是日常生活或例行工作的點滴，有時記有時不記，另有將生活中較特別的事記錄下來，譬如訪客登門拜訪，大半是記載的重點，外出亦然。兩人的日記中，偶爾會提到看報紙，但是看報紙是否爲生活中的慣例還是偶一爲之，這就很難判斷。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日記中有選擇性的不記載，並不表示生活中未曾發生。例如根據黃旺成先生日記，有些日子他會記載洗澡、換衣的舉動，[30] 但不能在他沒有紀錄的情況下，斷定他那天沒有沐浴、更衣。

兩位日記記主依序描述每天早晨起床到夜晚上床之間的活動。陳岺特別記錄起床、就寢的時間，有時還記了午休的時間；楊水心則較爲率性，有時不照時辰，有時乾脆不標出時辰。陳岺的日記是用毛筆寫的，毛筆不便攜帶出門，遇到外出旅遊時，回頭補寫的成份較大。楊水心的日記雖然用鋼筆寫，未必有隨時攜帶日記的習慣，因此長途旅行時，經常不寫日記；有時寫到一半就打住，似乎正在寫日記時被打斷。[31]

---

29 參見頁 248 所附原文。

30 黃旺成著，許雪姬編註，《黃旺成先生日記 (一)》(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，2008)，頁 298，1912 年 6 月 25 日；頁 300，1912 年 6 月 26 日。

31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2 月 10 日的日記，最後一句：「今早賴氏媚……」又如 3 月 15 日：「本日午前入……」又如 6 月 5 日：「……，為輕煙不……」皆無下文。

日記以描寫自己為重心，但也提及親友。陳岺生活的重心在於如何在丈夫死後掌管家計，她每日必須指揮擔任各種職務的男、女傭人，像是掌櫃的煥文，與專門為她處理日人關係、日人信件的林坤山，以及幫忙帶小孩煌兒 (應是鶴年) 的漢嫂；第二群人是她的外家，如長兄 (陳杰夫)、二兄、嫂子、侄女；丈夫方面的親戚有三房林獻堂、二房林烈堂、五房林階堂、四房林澄堂，以及他們的妻子。第三群人物則是她的四個兒子。楊水心的丈夫交遊廣濶，除了日記中有一半紀錄丈夫的活動外，丈夫從事民族運動的伙伴，甚至石塚英藏總督於 1930 年來到林家時，也是她記載的對象。[32] 此外，日人官吏、警察、特務，也是被列入記載的另一群人。[33] 再加上她加入台中婦女親睦會、一新會，因此也有不少知名女士的名字被紀錄下來，例如蔡阿信醫師。[34] 從日記看來，她在日常生活中受丈夫的約束甚少，不但時常回彰化娘家，還到台中、台北、關仔嶺、遊歷台灣一週，甚至遠赴日本與中國旅行，對一個傳統婦女而言，這樣的自由與經歷，幾人能夠擁有？她本人也相當享受旅行、購物之樂，其日記書寫的範圍與內容，無疑比陳岺寬廣。

這兩本日記的記主，住的地方相距不遠，林紀堂夫婦並未住在頂厝的蓉鏡齋，而是自建房屋在頂、下厝之外，即頤圃，又營造一個可以步行前往、有園林花草、圈養禽獸的別墅，[35] 在台中又另有別墅。[36] 雖然她活動的範圍廣，但是留在本宅的日子多。至於楊水心則住在景薰樓中，有個極小、較遠的洪鑪別墅，不過，她從未去過，因此日記的空間主軸都在她的居所裏。

32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8 月 8 日。

33 如 1928 年 1 月 14 日日記：「Pú〔Pún〕-jit ê-po͘-sî ケイサツ様 lâi kap Góa chē，……」(本日下晡時，警察先生來與我坐……)

34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3 月 28 日。

35 由於林紀堂的別墅飼養鹿及七面鳥 (火鷄) 等動物，儼然成為一個小型動物園，又種植多種花草，因此親朋拜訪紀堂時，必定會前往一遊。參見 1916 年 2 月 11 日日記。

36 林紀堂若至臺中辦事，常留宿於臺中的別墅。1916 年 2 月 5 日日記記載：「午後一時我即坐轎出發往中，至三時到中之別莊矣。」

三、兩種日記的外部比較

如果要更進一步研究這兩位女士的日記，可將之置於比較的角度，以便提出一些較有意思的看法，本節先由兩者的外部比較著手。

(一) 使用的文字：前曾述及，兩個人都出生於彰化，家庭環境至少是小康以上，均受過漢文教育。陳岺的文字十分乾淨，全是漢文，很少用台式漢字，但亦用？悉 (chhōa，帶)，日記中錯字不多。文中她時常記載長子、長媳，如某次她聽聞魁梧在台北被捕，便在日記上寫道：「余聞之，甚喜天理昭彰，代余伸氣耳。」[37] 又如對其媳碧霞有所批評：「余觀碧之爲人無才少志，亦可笑可憐！」[38] 此外則很少批評他人。

她每篇日記平均在四、五十字內，最長的一篇也不過百來字，寫作文體接近文言文。由於寫日記時係日本時代，故文中有些當時的用語，如信用組合、銀行等字彙。她的漢文程度，既能課兒讀書，又可以閱讀報紙與小說，打麻將用「手談」一詞來形容，[39] 可見有一定的水準。何況家中還有長期奉養的漢文老師何趨庭，[40] 應該是可以請教的對象。

相對於「手談」，楊水心則用「樗蒲之戲」來形容打麻將。[41] 她的中文雖不如陳岺，但對於學習日語相當用心，在日記中偶用日文書寫，[42] 有次就記錄了她和一個日本女子叫後藤靜子的談了數十分鐘。[43] 據日記的日文辭彙來看，她具備初級的聽力，能用一些日文名詞、形容辭，日記中出現過 118 個日語詞彙，[44] 大半用片假名書寫，也有日式漢文，譬

---

37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2 月 23 日。

38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11 月 17 日。

39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1 月 2 日：「與姪女等手談至晚。」。

40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2 月 26 日、4 月 17 日。何趨庭是林家長期的漢文老師，連林獻堂都是他的學生。

41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3 月 12 日。雖然這兩個字她寫錯了，寫成「摴浦」之戲。

42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1 月 5 日、1 月 30 日，不盡舉。

43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8 月 2 日：「……適遇內地人共オハナシ數十分，名曰工藤靜子。」

44 由四年日記中統計出來，如ニモツ、オハヨウ、ウナギ。

如立候補、活動寫真、親權者、貸切 (常被寫成大切、カシキ〔リ〕)。唯一的日文句子是オモシロクナイ，用在與林獻堂討論女兒關關的婚事時，雙方意見不合，而使她感到無趣。[45] 此外還有一些台式的漢文，和陳岺日記一樣，常出現「炁」、「廣電話」(講電話)、旁經 (pâng-keng，房間)、適無趙 (tú-bô tiòh，沒遇到)、相出路、正平嘴□種 (右邊臉頰腫)。除這些日式、台式用語以中文寫成外，她還使用教會羅馬字 (白話字) 來寫日記，以 1928 年的日記用得最多，高達 105 天。1928 年她的日記缺了 48 天，在 3/7 日記中有 1/3 是以白話字寫成。白話字的部分，也有 10 多天攙雜中文人名。[46] 至於何時用中文，何時用白話字書寫，似無一定規則，前面較規律，一天中文、一天白話文，日期愈往後則尋不出任何原則，到了 1930 年的日記，用白話字紀錄的越來越少，只有 10 天，其中有 4 天中攙了不少中文。1934、1942 年的日記則不再使用白話字。楊水心習白話字自然是受到教會影響；而早期《台灣文化協會會報》擬以白話字書寫，利用其音、文合一的特色，讓沒有受漢文教育的文盲或婦女能很快地學習。1928 年可能是剛好學會，因此不斷地透過日記練習，但是其拼音、標音經常出現錯誤。[47]

楊水心的日記，讀來像是各種語文的混合體，若未能抓住文章的訣竅，深入了解林家親屬關係，或參照林獻堂日記，則很難讀懂她留下來的這四本日記。

(二) 年齡、性格與身分：陳岺生於 1875 年，楊水心生於 1882 年，陳岺比楊水心年長 8 歲；陳岺是林紀堂的側室，林紀堂的正室為鹿港人莊賽金，[48] 無出，死於 1919 年。林紀堂既未續絃也未扶正陳岺，這也許

---

45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8 月 8 日：「……與主人共商阿關之婚事，為兩人生オモシロクナイ。」

46 舉〈楊水心日記〉10 月 5 日所載：「pún-chá ū kap A-koan、秋福去牛込館khòa[khòa^{n}] ōa-tāng-siá-chin kàu ià [iā] kan ê si[sî] kap Chú-lâng、Hûn-liông、Eng〔Enĝ〕-chiong Liok[Liok]-liông Beng[Lêng]-sek khì Te[Tē]-kek[kèk] khòa[khòa^{n}]ランス。」(本早有與阿關、秋福去牛込館看活動寫真，到夜間的時，與主人、雲龍、榮鐘、靈石去地極看跳舞。)

47 見前註即可知她拼音、標音錯誤之處。

48 林獻堂，《林氏族譜》(霧峰：自刊本，1937)，參見世系圖。

是林紀堂只比正室多活了 3 年不久即過世有關。陳岺非正室，又是未亡人，其夫雖然是頂厝五兄弟的老大，但陳岺在林家十分低調，和丈夫林紀堂一樣，不太預聞公共儀典，即便參加也是早去早回。自身的娛樂即手談、閱讀，或爲了解悶而飲酒。由於她必須恰如其分地扮演「未亡人」低調的身份，除非有事必須找家族中的男性商談，否則不輕易出門。林獻堂有「未亡人の神樣」[49] (未亡人的神)的稱號，亦即家族內未亡人的軍師，爲她們排難解紛，給予適時的幫助。將林獻堂和陳岺的日記兩相對照，彼此互動的情形相當多，林獻堂要她善盡家族義務，分擔寄附金，[50] 她則在子弟的管理上有賴林獻堂的協助。[51]

反觀楊水心，丈夫林獻堂年輕時不免氣盛，後因從事政治運動，成爲觀瞻人物。丈夫除了在老年與秀玉私生一子外，並未正式娶妾，當時不僅在霧峰林家，連在傳統富紳家庭中亦極爲少見。而林獻堂又頗能尊重女性，與妻子雖偶有不合，卻能充分體諒，兩人又是戲迷，時常結伴或帶著家人、僕婢前往看電影，有共同的興趣。林獻堂又讓她能自主的到台灣各地、日本、中國遊歷，還陪她參加台中婦女親睦會，聽她演講預演並給予指導，[52] 爲她打開社交的空間；她又好客，因此見多識廣。在日記中，她雖有生爲女性的煩惱，但她毋寧是自由的，生活中充滿了歡樂。因此在字裡行間表露出不同於陳岺的謹嚴、單調。雖然妾、妻的名份並非兩人日記表現不同的主要原因，但因爲陳岺身爲「未亡人」，沒有來自丈夫的關懷與支持，再加上長、次子不肖，又沒有強大的「外家」做爲後援，也是導致心情不開朗，影響其日記表現的因素。

---

49 林家親戚接受訪問時說的，意指林家的未亡人甚至非林家的女性，常來請教林獻堂相關家務事，如賴麵、許悅、林英、賴霞等人。

50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9 月 4 日，對台南長老教中學的捐獻，林獻堂捐 1,000 円，而陳岺捐 400 円。

51 由《灌園先生日記》(一) 到 (十一) (1927-1939) 有關陳岺的事，不下百條，皆是有關財產信託、諸子教養等問題。

52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9 月 12 日、10 月 5 日。

四、日記中的生活

相較於黃仁宇《從大歷史的角色談蔣介石日記》，[53] 筆者選擇用陳岺、楊水心兩女士的日記入手，由傳統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去發現小歷史。她們兩位都嫁入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霧峰林家，因此所呈現的是富紳家庭的生活，有別於張麗俊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中所記載的中、下層婦女 (保正之妻，一般家庭主婦及一些歡場女子)。筆者將日記中所觀察到的婦女生活，分成以下 6 個方面來探討。

(一) 宗教信仰：霧峰林家成員的信仰，有佛教、基督教，當然少不了民間宗教。陳岺在日記中載明，她每早起床梳洗後到吃早飯前要「拜斗宣經」，[54] 遇事則延至吃過早飯，甚至吃過晚飯後。此外並依照神明的祭日而拜拜，例如農曆 1 月 9 日拜天公；元宵節準備牲禮到公地拜三官大帝和祖先；媽祖誕辰也要祭拜；7 月 1 日開鬼門普濟陰光時，她除了準備牲禮讓傭人挑到大突寮去祭陰光，也在自家外庭拜；七夕則於晚間拜雙星；7 月終關鬼門時，令其子到詹厝園普施，下午 5 時回到自宅祭祀。[55] 從日記中可知她祭祀頗勤，偶而因被長子氣炸，在拜斗宣經後，爲此事抽籤。如 1924 年 10 月 28 日：「……余拜斗宣經畢，求二籤，均中平，辛癸／己壬，問冤孽何日得報。」偶而也捐點小錢，譬如捐了 1 円贊助打造天公爐，捐了 6 円做戲。[56] 送次子津梁坐船赴日時，順便帶兩個小兒子在台北市旅遊，進到龍山寺捐了一円的油香。[57] 她對基督教似乎也不排斥，在林紀堂生前，曾有人到其家傳道，[58] 而她的第三子林松齡也在台南就讀長老教會中學時，回家會講聖經給她聽，她在日記寫道：

53 黃仁宇，《從大歷史的角色說蔣介石日記》(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08)。

54 如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2 月 5 日：「拜斗宣經完方吃早飯。……」

55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2 月 13、19 日、4 月 16 日、8 月 1、7、29 日。

56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2 月 12 日。

57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9 月 18 日。

58 〈林紀堂日記〉，1915 年 3 月 31 日。

「頗有心得。」[59] 至於信教的虔誠度，無法從日記得知，字裏行間中從未表現出她生病時求助於神明。

再看楊水心的日記，則較少見有關宗教的記載。不過，當林獻堂自歐美遊歷轉至日本養病，不即刻回台時，她常在夜深掛念丈夫，害怕到起雞皮疙瘩，煩惱萬分。[60] 由於丈夫遠在日本養病，她在得不到完整的資訊下，心中惴惴不安，乃回彰化娘家拜天公壇，拜求玉皇大帝，並做善捐；又對林階堂說，林獻堂要往東南方向才合適等話，出現求神的舉動。[61] 戰爭期間林獻堂常在堂嫂陳薄燕 (青桐林第一任住持)、許悅的邀請下到青桐林去清修或參加法會，楊水心很少相隨。同時林家也相當善待基督徒，尤其是霧峰教會的傳道或牧師，該教會的建地不但由林家所捐，其子林攀龍一度成爲基督教傳道的指標性人物，[62] 他和家族都會捐錢給教會。而爲了提振台灣文化所籌辦的「一新會」，會中都有牧師參與的踪跡，或參加活動，或進行演講。林獻堂還一度成爲基督教的慕道友，[63] 並且鼓勵婦女學習白話字。其長子林攀龍也出入教會，甚至一度出任霧峰基督教會的長老。[64] 林獻堂來往的同志中，蔡培火、韓石泉、王受祿、陳茂源都是基督徒，他的親家高金聲家更是南部最重要的基督徒家庭。尤其她特別疼的女兒關關結婚後成爲基督徒，她受到關關的宗教影響當亦可以想見。上述的因緣使得楊水心偶而會聽教會人士講道，[65] 她也勤學白話字，使用白話字寫信。由兩人的日記看來，她們都有宗教信仰，陳岺寫下了宗教活動，楊水心則較少觸及；陳岺即便有祭祀活動紀錄，卻非熱忱的宗教信仰者。

---

59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3 月 26 日。

60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6 月 62 日。

61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6 月 23 日、6 月 25 日。

62 黃子寧，〈林獻堂與基督教 1927-1945〉，收入許雪姬主編，《日記與台灣史研究》下冊 (台北：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，2008)，頁 687。

63 黃子寧，〈林獻堂與基督教 1927-1945〉，收入《日記與台灣史研究》下冊，頁 711-712。

64 霧峰基督長老教會，《霧峰基督長老教會設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》(霧峰：該會，1984)，頁 14，〈兩任長老芳名〉，任職期間為 1933.11-1938.12。

65 林獻堂著、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七) 一九三四年》，頁 7，1934 年 1 月 5 日。是日為基督徒劉天來的講道，霧峰教會的傳道李崑玉與信徒紀明新一同前來。

(二) 飲食：林家有魚翅、毛蟹等拿手菜，[66] 霧峰當地也有刣頭筍、[67] 鳳梨等名產，這兩位女士在日記中可曾透露出什麼樣的食物特色？陳岺日記中寫了一些寄給在日本、台南讀書的兒子們的食物，如肉脯、雞肝、麵茶、魚子、煙腸 (香腸)、柑仔、肉干、烏龍茶等。她自己也會下廚做粿、湯圓以饗家人。[68] 潤餅 (或寫成倫餅，閩南話音接近) 在楊水心日記中不斷出現，是自家團圓或請客時必備的食品。[69] 楊水心的孫子林博正在接受訪問時，也談及家中經常吃得到祖母做的潤餅，而祖父林獻堂最愛吃的則是焢肉。[70] 其實兩位林家的家庭主婦恐怕是不親操井臼的，陳岺平常有人幫她煮飯，遇有飯局時，比如要宴請林茂生，即請來廚子阿模操刀。[71] 楊水心則是請街上的福州師傅慶和煮數碗料理 (不是 4 碗就是 8 碗)。[72] 大家族有時甚至聘請名廚在家中做菜宴客，做為最重要的社交內容。

(三) 婆媳之間：中國社會最難處理的是婆媳關係。陳岺面對的是長子魁梧的妻子楊碧霞，她是楊肇嘉的妹妹。林魁梧擔任堂伯父林文欽所留下來的繹樂軒樂社的經理，除了親自教授外，也負責統籌社團的所有開支，包括人事支出，後因社員星散，戲服被偷走而告散社，而他也為此耗盡家財，以致其父在 1920 年做遺言公證時，並未分給已成年的魁梧田產，而是以 500 石租分給其妻楊碧霞，以便魁梧能獲得起碼的溫飽，卻又不致於賣掉田產。然而魁梧時常招妓到家，令楊碧霞十分難堪，且又有毆打妻子的惡行，時而取鬧，使碧霞有時不得不回清水娘家，或隨其婆婆住在霧峰或台中。夫妻兩人最後如前所述，以離婚收場，此不再贅述。津梁之妻婉如，是三角仔人，出身名門，因為丈夫的不爭氣，導

66 許雪姬訪問、王美雪紀錄，〈劉秀霞女士訪問紀錄〉，未刊稿。劉秀霞為林獻堂的侄媳婦。

67 莊嵩，《太岳詩草》上冊 (台北：龍文，1992)，頁 33，〈黃竹坑〉。

68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3 月 5 日、11 月 15 日、12 月 21 日。

69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1 月 20 [19] 日：「本日做倫〔潤」餅請天成，適秀眉來與阿關座談，留到夜餐。」

70 許雪姬，《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》頂厝篇，頁 104，〈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〉。

71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8 月 17 日，後賞模 2 円。

72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4 年 5 月 4 日，7 月 17 日。

致與婆婆難以相處，即使有林獻堂居中勸導，仍未能解開心結。[73] 由上可知，陳岺與媳婦的關係並不融洽，這和她對長、次子的浪費習性產生反感有很大的關聯。

與陳岺相比，楊水心則較爲幸運。如上所述，雖然剛開始和一個來自日本的媳婦相處互有摩擦，但是隨著日子一久，婆媳關係漸好。雖然往後與繼媳亦和平相處，但對前媳的疼愛與不捨亦可由此知之。第三個媳婦爲楊雪霞，是梧棲富戶楊子培的掌上明珠，爲了這件親事，她還親自前往彰化女中去探視未來的兒媳婦，十分滿意，[74] 而後訂親。不料婚後，才知道雪霞原來患有肺癆病，並在台中別居，而後爲了治病還遠赴日本就醫。雪霞在新高港築港時，預測梧棲土地會上漲，乃借錢買地，[75] 後因新高港開港未完成，地價不漲反跌，欠下 10 萬円的債務，[76] 但亦未見楊水心爲此事予以責備。長媳曾珠如是霧峰人，曾家原與林家熟識，然而珠如未曾生產 (曾流產)，亦未見公婆責怪。不過當珠如要將博正 (猶龍、藤井愛子的長子) 過房爲子時，楊水心則表達反對，原因不詳。[77]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女婿高天成。由於楊水心疼愛女兒關關，因此天成也被愛屋及烏。當高天成在鹽水開業時，楊水心時往看望。[78] 赴日遊玩時常常是關關帶著她出遊、「血拼」、看電影。有一次夫妻倆還陪楊水心遠赴北京遊覽。[79] 當林家大大小小生了病，天成都是最好的諮商對象，1938～1939 年林獻堂折足在日本靜養期間，高天成發揮了大作用。由此看來，比起陳岺，楊水心與兒媳、女婿間的相處來得更爲和睦。

(四) 休閒生活：做爲富紳家族的婦女才能享有所謂「休閒」生活。

73　〈灌園先生日記〉，1947 年 7 月 1 日。

74　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4 月 7 日、4 月 15 日。日記中雪霞却誤為繡 [秀] 霞，還是一開始要娶的是楊子培的長女？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鍾淑敏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二) 一九二九年》，頁 30，1929 年 1 月 23 日。

75　林獻堂著、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十四) 一九四二年》，頁 223，1942 年 8 月 29 日。

76　林獻堂，〈灌園先生日記〉，1943 年 3 月 18 日、4 月 25 日、5 月 2 日。

77　許雪姬，〈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〉，頁 111。

78　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9 月 2 日。

79　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4 年 9 月 9 日。

陳岺以閱報、讀小說、偶爾的出遊為其休閒，她在日記中常載「無事可做閱報」、「早餐後閱報」、「無聊閱報」。[80] 她到底看什麼報紙？有可能是當時號稱台灣三大報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、《台灣新聞》、《台南新報》，外加 1923 年 4 月 15 日出刊的《台灣民報》。林家訂有報紙，連日本巡查都到她家去借閱報紙。[81] 除了看台灣的報紙，她也向林階堂借上海的報紙 (應該是舊新聞) 來看，甚至閱讀小說，諸如《清秘史》(也許是《清宮秘史》)。[82] 甚至因為貪看小說太急，而頭痛目昏，必須略憩片刻。[83] 至於出遊的記載，在 1923 年的日記中僅出現一次，那是 9 月 16 日到 9 月 20 日到台北送津梁赴日本繼續學業時，到各地遊覽。這次旅遊一共用掉 280 円。以其 9 月 18 日的日記來看她的旅遊狀況：

> 七時起，事畢，乘人力車三台遊龍山寺、添油香一円，即到總督花園，觀各種花草，實目所未睹。後到公園博物館，洋式三層樓美麗并陳列萬物，台北第一。十時返，即叫江山樓料理四色。大家飽餐後，一時，再乘汽動車至圓山各名勝畢，後往北投洗溫泉，五時返寓，倦甚，十時眠。

翌日送松齡上備後丸，她也上船參觀，9 月 23 日回到霧峰，這是她離家最長的一次。依日記所載情形來看，她在此之前，於農曆 9 月 9 日 (10 月 7 日) 回到彰化，參觀迎媽祖儀式，至於停留幾天則不詳。(自 10 月 3 日到 10 月 21 日日記缺。)[84]

反觀楊水心的休閒則多采多姿，她因為有丈夫支持，且設有管家管理眾多僕婢，管理僕婢之事毋須操心，因此能放心出遊。由 1928、1930、1934、1942 年的日記可知，她有多次旅遊的紀錄。以 1928 年為例，她由女兒陪同前往日本，此次赴日，一直到 10 月 8 日才離開，在日本長達 69 天。在這期間，因為處在說日語的環境，得以趁機抽空溫習日語。[85] 不

---

80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3 月 10 日、3 月 17 日、5 月 25 日。
81 〈林紀堂日記〉，1915 年 5 月 6 日。
82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8 月 11 日。
83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12 月 4 日。
84 〈陳岺日記〉，1923 年 10 月 1 日。
85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28 年 8 月 20 日、22 日、23 日。(8 月 20 日：「本早有溫習國

過她來日本的重點是在看電影、觀戲劇、購物、享受美食、到東京近郊旅遊。8 月 24 日她到銀座邦樂座看完電影後，到松坂屋去吃法國料理。28 日前往高圓寺館觀看「人情大悲話劇肉体の道」；9 月 18 日到淺草松竹座看活動寫真；9 月 20 日再到松竹看電影；隔天又到東京館看電影。10 月 2 日到上野公園看博覽會，再到國技館賞菊花；10 月 5 日去牛込館看電影，晚上再去欣賞跳舞，前後共看了 6 次。至於外出購物方面，例如曾經去天賞堂換錶，到東京火車站的マルビル、銀座丸善、白木屋等地購物。9 月 4 日又到銀座三越購物，9 月 8 日到新宿ホテヤ，又到帝國ホテル飲茶，到日比谷公園玩，到銀座吃西洋料理。9 月 13 日到橫濱遊玩，並到今天仍在的名店—聘珍樓吃晚飯。上述熱絡的活動，她都帶著關關，或者雲龍、靈石這些人同往，一者可以帶路，二者可以爲她解釋日語發音的電影。由上述簡單的敘述可知其赴日消遙的一斑。

(五) 參與婦女團體：有關這部分，陳岺幾乎是交白卷，很可能她是妾，又守寡，這樣的身份，在當時受到社會諸多的限制使然。舉例來說，霧峰一新會在選舉委員時，林瑞騰的妾洪浣翠被選爲委員而遭致反對，理由是妾沒有加入會員的資格，何況是委員。林獻堂、林攀龍父子，極力爲此勸解「說明自來蓄妾之制度不好，並非妾之罪，她雖爲妾，亦當尊重其人物。她雖被選爲委員，她亦未必敢受。」[86] 後來洪浣翠果真不敢接受。可見妾在家族中地位不高，再加上缺少丈夫的助力，本性又較爲內向、文靜，再受魁梧、津梁兩子不肖所苦，幾無社交可言。

反觀楊水心，生性活潑，子女爭氣，又有林獻堂在背後鼓勵，並陪同出席公共場合，使其在家能適切地扮演女主人，上至招待總督下至親友等客人；在外也能成爲婦女的領袖。1930 年 8 月 15 日陳逢源、郭東周、陳朔方三人的妻子，都是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女性，前往霧峰請她擔任台中婦女親睦會的會長。按台中婦女親睦會算是純粹婦女組織的會，雖

語。」8 月 22 日：「我亦習國語。」8 月 23 日：「本日有看國語。」）

86 林獻堂著，許雪姬、周婉窈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五) 一九三二年》，頁 119，1932 年 3 月 16 日。

然成立比彰化、嘉義爲晚，[87] 但可以說是「打破向來泥古陋習」，因此她也邀請以往有參加過彰化婦女共勵會的吳素貞加入。[88] 當上述三位夫人等再度到林宅邀請她擔任該會的常務理事，並商量發起大會的日期時，她力辭不敢接受，只聲明願意做普通的會員即可。後來林獻堂爲此事出面代爲處理，亦即僅當普通理事。[89] 等到籌備其子雲龍婚事告一段落後，她又被邀請在該會開會時當議長，這次必須要當眾致詞，她才開始在丈夫、兩個兒子，以及兒媳婦雪霞面前反覆練習，[90] 而後到興業信用組合赴會，圓滿達成任務。[91] 之後林家的婦女也陸續加入該會，往後有定期例行會議，她也會前往參加。[92]

除了婦女親睦會外，1932 年 3 月 29 日以林攀龍爲首，創立的一新會，主要目的是在「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，使漸即自治之精神，以期新台灣文化之建設」，楊水心加入爲一新會會員，該會婦女幾占四分之一，[93] 可說是日治時期同類會中女性占最多數的會。她不僅參加土曜講座 (後改爲日曜講座) 聆聽演講，也專心準備「機會」這個主題，以便在 2 月 11 日的講座中演講，還組成了婦女親睦會，參與其中，並述「親睦之意」。[94] 前曾述及同一年她曾到屏東一帶遊歷，6 月 10 日應邀在日曜講座講述「南部旅行」，談參觀孤兒院、鵝鑾鼻、サンテイモン (三地門) 之感想。她還先說了一遍給在家幫傭的外甥女阿綢聽，共講了 55 分之久。[95] 一位只受過舊式教育的女性，卻能在丈夫及同儕訓練

87 楊翠，《日治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：以《台灣民報》為分析場域 (一九二O～一九三三年)》(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93)，頁 529-545。即彰化婦女共勵會 (1925)、諸羅婦女協進會 (1926)，見頁 557-563，台中婦女親睦會。

88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8 月 19、24 日。

89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9 月 12 日。

90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9 月 12 日、10 月 5、7 日。

91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10 月 7 日。

92 〈楊水心日記〉，1930 年 10 月 6 日、11 月 16 日、12 月 15 日。

93 依 1932 年 3 月所統計，男性 233 人，女性 67 人。見霧峰一新會，《會員名簿》，頁 3。

94 林獻堂著、許雪姬主編，《灌園先生日記 (七) 一九三四年》，頁 213，1934 年 5 月 27 日，婦女親睦會設在社會部。

95 同上註，頁 233，1934 年 6 月 10 日。

下侃侃而談，不能不說是她個人的聰慧以及丈夫鼓勵的結果。吳素貞 (林吳帖) 戰後當選國大代表，並能扮演得恰如其分，她亦自稱是受到一新會訓練的成果。[96]

五、結　　論

本文由陳岺 1923 年，以及楊水心 1927、1930、1934、1942 年這五本日記來探討日治時期難得一見的女性日記。這兩位女士的日記有什麼重要性值得介紹？首先，以目前最廣為學界所用的《灌園先生日記》，自 1927 年寫至 1955 年，大正年間以前不見記載。相較之下，陳岺寫於 1923 年的日記，則讓我們對一個寡婦在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，以及林獻堂的部分活動有所了解；而楊水心 1928 年的日記，正好是林獻堂日記中缺的那一年，雖然他在歐美旅遊時有《環球遊記》可以概觀，但是這段期間家中發生的事情，以及自 5 月轉至日本，何以滯日不歸，迄不明白。楊水心的日記則讓我們了解其夫因病在日本慶應醫大就醫，由外甥靈石陪伴，而住在他們位於日本的住所—馬橋別莊。1923、1928 年是目前少見、寫於大正後期、昭和初期的女性日記。目前所知大正期的日記只有黃旺成日記，自 1912 年寫起，這一本男性訓導的日記，其重要性價值連城自不在話下，但是兩位女性日記的稀有與獨特性也不遑多讓。

女性日記的重要性可以透過與丈夫的日記相對照，亦即陳岺的丈夫林紀堂有 1915、1916 年的日記補充對照，楊水心的丈夫林獻堂亦有日記相互參照，雖然陳岺這本日記是丈夫死後隔一年寫的，但由兩人的日記可以推知兩人間的關係，以及兩人為四個孩子的付出，以及紀堂的養生活動、內向性格，陳岺的固執、堅強；若再對照楊水心、林獻堂日記中對陳岺的描繪，陳岺的形像即呼之欲出。而楊水心 1930、1934、1942 年的日記和林獻堂日記的互補性很高，但其亦記載以女性自我為中心。兩部女性的日記不只和丈夫 (男性) 對照，突顯出男、女性日記的異同，若

96　林吳帖，《我的記述》(台中：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印贈，1970)，頁 47。

再加上當時社會的報導，以及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中的女性描述，就可以由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史豐富的女性史史料，建立出多樣的女性形像，只要有人肯利用這些資料撰寫論文，甚至可與竹中信子大半參考報紙寫出來的《植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》相頡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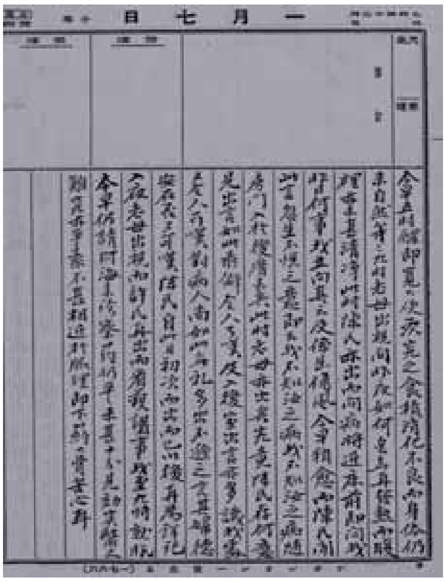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個重要性是兩人的日記書寫形式。她們用以表達的文體相當多樣化，有漢文、白話文、日式漢文、台語，或用日語的名詞、形容詞直接成爲台語的外來語，甚至使用與漢文關係淺的白話字來表示。在這樣的書寫下，如果不具備上述這幾種語文能力，以及對這個家族的理解，要讀懂這些日記並非易事。因此這兩部女性書寫的形式也是往後值得研究的另一道課題。

第四，這兩位受傳統教育而未接受正規現代教育的女性，由於做爲富紳的妻子，有很多機會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，像是出外旅遊的機會，都讓這兩位婦女身份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，尤其是楊水心，接觸基督教後，習得白話字，又和林獻堂一樣努力學習日語。在日記中她用的日語形容詞、名詞，比林獻堂還要來得多。雖然難免有拼錯的時候。目前所知戰前被研究的婦女，不是接受過教育的現代女性，就是在社會底層的娼妓，要不就是女學生一類，對於台灣士紳階級、受傳統教育的這類婦女研究得較少，這類女性其實很值得探討。如台中婦女親睦會的婦女都受過新式教育，其活動性及知識性都不差，何以找上楊水心，主要是考慮到她不但有號召力，在家族婦女中頗有地位，能招募家中婦女加入，在捐款方面又不落人後，再加上林獻堂在台灣民族運動的角色，漸漸地形勢比人強，雖然她不能算是婦女界領袖，但是在妻以夫爲貴的加持下，多少在婦女界也產生一些影響力。這一類的婦女對社會有何影響，亦是往後研究的要點。至於殖民統治如何影響、改變了傳統婦女的生活，亦可進一步追索。

第五，再就兩位記主的性格、日記的書寫重心，以及和男性的日記來比較，亦能得到一些有趣面向。陳岺因係副妣，又守寡，再加上四子中，長子忤逆，在日記中常以孽子稱之，次子津梁在日本讀書亦不學好、浪費成性、不愛讀書，回台灣休假時也一路借錢，招朋引伴，費用全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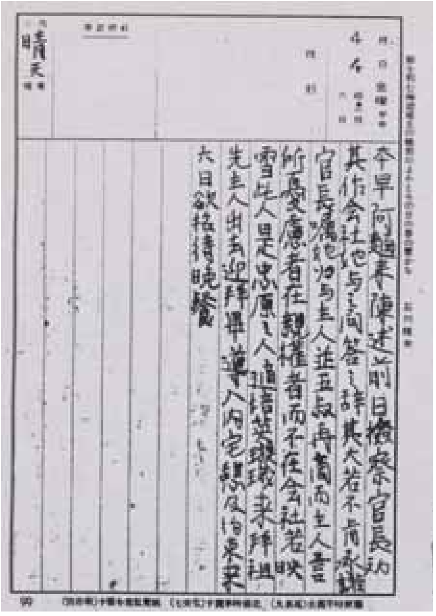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清償，使陳岺為這兩個兒子傷心透頂，三子松齡後來也和母親鬧翻搬出去住，和長媳、次媳亦不相得。長媳最後離林家而去，這些日中煩事，再加上她必須持家，並支配傭人才能管理家業，故常心情不好，偶而也要喝喝悶酒。她日記所載大半是兒子、傭人與家事。楊水心初時雖亦苦於和次媳間尚未磨合成功，女兒、長子的婚姻、三子雲龍的浪費成性，都一度是她念茲在茲的事，但她時常和丈夫看遍各種電影、戲劇，到日本、中國旅遊，因此眼界開闊，精明而不刻薄，雖然親戚中亦有人稱之為たぬき(狸)。她的日記中仍以家中成員發生的事為記載要點，也記錄林獻堂重要的公眾活動。兩人日記中相同的是，她們對周遭政治情勢的變化較少着墨，只有陳岺時常記載米價，因為收租金是她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，她必須時時注意米價高低好擇時賣出。楊水心日記中則不見記載任何物價，主要是家計有丈夫和管家在處理，不必親自介入這些瑣碎的事。1930 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發生時，她也有所記載：「午後聽根樣陳述在台灣新聞社前看揭示，本早在霧社開運動會，生蕃反面殺死數百人，郡守、警部，……」。這段文字和林獻堂日記所載幾乎一樣，不過在此之後林獻堂持續關心此事，楊水心則已不再記述，由此也可看出這兩部女性日記有其異於男性日記之處，雖有助於吾人對夫妻、母子、婆媳之間的家庭生活更進一步了解，但亦有其使用的極限。

本文描述這兩部日記的記主生平、書寫的格式，外部的特質以及日記中所顯示的生活，目的是希望能介紹這兩本絕無僅有的日治時期士紳之妻的日記，並有益於了解當時台灣人士上層階級的生活樣貌，以及婦女在家中的角色、地位，甚至她們與妯娌、叔侄間的互動，和娘家的來往等活動。這兩部日記目前已經解讀完畢，再經修訂，即可考慮出版問題，以嘉惠研究者。



1916 年〈林紀堂日記〉中對妻陳岺的抱怨

〈陳岺日記〉中有一些當時物價的資料，用蘇州碼記載



1930 年 4 月 4 日林獻堂、楊水心夫妻的日記內容比較

〈陳岺日記〉中最長的一篇

〈陳岺日記〉中談到「亡夫」的部分不多，此日談到「亡夫冥壽」是其中之一

1928 年 8 月 23 日〈楊水心日記〉沒寫完

用白話字寫的〈楊水心日記〉

1930 年楊水心日記內頁中的花卉 (彩色)

「大切」(貸切)、「ニユース」是〈楊水心日記〉中的日文字彙